

20  
世纪人文学术史  
研究丛书

# 中国藏学史

(1949年前)

王尧 王后龙 邓小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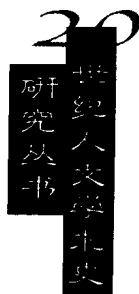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 中国藏学史

(1949年前)

王尧 王启龙 邓小咏 著



民族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关于中国藏学研究史的一部学术史专著。作者探讨了“藏学”研究的学科特点、对象范围等基本问题,将1949年前的藏学研究划分为萌芽时期(1840—1911)、创立时期(1912—1937)、艰难发展时期(1938—1949),并在大量文献爬梳、收集的基础上,对传统藏学的相关文献以及1949年前藏学研究各个阶段的成果做了系统地整理,分门别类加以概括介绍和评介,全面总结了1949年前中国藏学研究的学术成果。

本书有利于读者了解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分支——藏学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是相关研究者了解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参考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王尧,王启龙,邓小咏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3

(20世纪人文学术史研究丛书)

ISBN 7-105-03521-8

I. 中… II. ①王…②王…③邓… III. 藏学—历史—研究—中国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12500号

出 版 者:民族出版社(北京和平里北街14号,邮编100013)

<http://www.e56.com.cn>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100084)

<http://www.tup.com.cn>

责任编辑:王维强 岳秀坤

印 刷 者: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发 行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11.5 字数:331千字

版 次:2003年4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105-03521-8/K·358

印 数:0001~3000

定 价:28.00元



# 20世纪人文学术史研究丛书

## 学术指导委员会

召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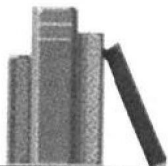
张岂之

成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桂生 任继愈 陈平原

何兆武 李学勤 张岂之

张岱年 季羨林 葛兆光



## “20 世纪人文学学术史研究丛书” 序

“20 世纪人文学学术史研究丛书”经过四年的努力，陆续和读者朋友们见面了。

1998 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负责人胡显章、徐葆耕教授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建议将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学术史作为人文学院科学研究的重要项目之一，并希望在几年内出版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定名为“20 世纪人文学学术史研究丛书”。

为保证书的质量，学院组成了学术小组，聘请老一辈知名学者季羨林、张岱年、任继愈先生，还有胡显章、何兆武、李学勤等教授共同进行指导，由我负责学术小组的召集。选题确定、书稿审定等有关质量鉴定的诸事宜，都由学术小组承担。这里要特别感谢季羨林、张岱年、任继愈先生，他们给这套学术丛书以宝贵的指导。徐葆耕教授没有参加学术小组，但他为丛书的出版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

选题和作者的确定，徐葆耕教授建议向全国征集，最后交学术小组审定。1998 年 4 月学术小组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了申请选题的广告，当月我们便收到数以百计的申请材料，由我和欧阳军喜博士加以整理，提交学术小组。经仔细讨论，有十个选题被选中。例如：胡伟希著《知识、逻辑与价值——中国新实在论思潮的兴起》，金岳霖先生曾长期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他在逻辑学和哲学研究中的新实在论方法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界影响很大。刘鄂培教授等著《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张岱年先生同样曾长期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还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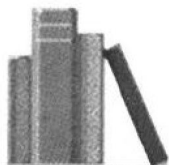
刘桂生、朱育和著《1925—1952年的清华史学》，主要写清华大学的史学教学与研究，联系当时全国的史学。有的书与清华联系不多，甚至毫无联系，如郑杰文著《20世纪墨学史研究》，儒学和道家学派的研究已出版不少专著，惟独墨学研究缺少应有的学术评估，事实上20世纪中国人文学者对墨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需要加以归纳总结。丛书中还有王子今著《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文献学是我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分支，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在近代又借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建树颇丰，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限于篇幅，关于课题这里不一一加以介绍。总之丛书内容与清华有密切联系者和无多大关联者各占一半；作者中清华教授和兄弟学校教授也是对半。

学术小组实际是从书的编委会，受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委托，需要对每部书稿进行质量审查。审稿人不限于学术小组成员。审稿采取匿名制。收到审稿意见后，由我和欧阳军喜博士加以整理转送出版社。出版社再加以审核整理后将修改意见反馈给书稿作者。每部书稿都经过认真修改，有的修改量较大。修改时间一般在半年左右，可见这项工作相当繁重。

出版社要求书中所引资料逐一加以复查，力求避免在材料的引证上发生差错，这是人文学术研究规范化的基本要求。从这里读者朋友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丛书经历了几个春秋才得以出版。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丛书远远没有概括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全部内容，只是其中若干“点”的研究。全面完整地审视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研究成果，要靠我国人文学者的共同努力，出版多种学术风格的研究著作，相互比较，截长补短，庶几以成。这不是几年时间能够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抛砖引玉，我们至诚地希望专家和读者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2002年1月于清华园



## 序 言

王 尧

藏学(Tibetan Studies, Tibtology)是我们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的固有学科,过去许多年,远的不说,就拿唐朝以来的五代、宋元明清各代,都有一批官员学者、使臣商贾和僧侣关心藏区的历史、文化、风俗、宗教,留下不少的著作,而国家力量修撰的官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宋史》都有“吐蕃传”的专门章节,而《元史》的“释老传”、《明史》的“乌斯藏大宝法王”、《清史稿》则列有“西藏”专章。可以说是系统地记录了藏族历史。而唐代的刘元鼎的《使吐蕃经见纪略》更是一篇第一手的忠实调查报告,颇具文学意味,又很有风土情趣。至于敦煌文献(下面将有专门叙述)可以说远在唐代我们国人先辈就留下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当然,很多历史档案是对西藏地方治理的记录,也可以作为对西藏的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源。

上世纪初,1904年的枪声,警惊了国人的酣梦,列强入侵,帝国主义企图分裂和霸占我国边疆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而西藏一隅迅速进入了国人的关注之中。一批有深沉忧患意识的学者及研究团体先后在各自的领域展开对西藏及其他藏族地区的调查研究,正如顾颉刚先生在考察西北的藏族地区以后所说:“……遍涉黄河流域,当其登山、渡大川,吊古城、搜残碑,固飒飒乎其观、醺醺乎其味哉!然而农村之凋衰,人民之暗弱,刺于目而伤于心,恍若末日之将至……所至之地不忍



视而又不得不视,泪承于睫,以为如不急之谋,不但亡国,且灭种矣……九一八变起,北平密迩松辽,唇揭而齿寒,知祸之不旋踵。又目睹日韩浪人横行市中,毒及乡里,为之切齿腐心……”(《西北考察日记》自序)他老人家又发出急切呼吁:“强邻乘虚而入,肆其挑拨,以求分化,而裂痕乃益深。今日我国家所求者,合全国而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我民族之所求者,合全国各民族而团结为一个民族……”(《五凤苑藏汉词典》序)。

当时不仅是顾先生一人,有一批学者先后参加到西藏研究的行列中来。他们是张煦(怡菽)、任乃强(筱庄)、韩儒林(鸿庵)、庄学本、谢国安、刘立千、刘家驹、李安宅、于式玉、吴丰培、黄明信、蒋君章、法尊、观空……以及藏族人士格桑泽仁、格桑悦西等,蔚为大观。从东海之滨繁华的大城市上海、南京到重庆、西安、兰州、西宁等地先后有《边政公论》、《新亚细亚》、《康导月刊》、《康藏研究》、《新青海》等等一大批以西藏研究为主要园地的刊物出现,上面发表了许多反映康藏历史和现状、社会和人民生活文章,甚至还出现过以文成公主为题材的话剧剧本。所有这些都说明国人已经注意到研究西藏、了解西藏与保卫边疆、保卫国防的重要意义了,有不少文章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增强了凝聚力,值得我们着力去搜集、分析、研究。而《驻藏大臣考》(丁实存)、《拉萨见闻记》(朱少逸)、《西藏图考》、《康藏图经》(任乃强)、《甘青川藏考察记》(马鹤天)、《班禅大师全集》(刘家驹)等一大批重要著作的出现,反映出上一世纪30~40年代国人已经有了相当力量和相当水平的撰述;但不能否认,当时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更全面的有更大力度的研究工作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新一代人的肩上了。

所以,我们把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藏学研究列为上半段,划定为《中国藏学史》上册,而新中国成立以后(至2000年左右)的列为下册。

1949年10月是划时代的变化:首先在中央人民政府内设立了民族委员会(与过去的蒙藏委员会、蒙藏院、理藩院等等中央机构有了明显的不同),依照有关政策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一律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一系列的根本性原则,以共同纲领(即后来的宪法)颁行天





下。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藏学研究也顺应历史要求全方位地展开了。

由于时代所赐,新一代藏学研究人士得到前所未有的方便:(1)从事藏文文献(包括敦煌文献)对勘;(2)对语言、社会、历史和人文作了详尽的调查;以及(3)考古发掘地上地下的文物与历史、现实三位一体的结合研究。

在这里,我提供一些个人的经验和工作体会吧。

—

近20多年来(1978以来),改革开放使我国学术事业呈现了全面复兴、蓬勃发展的趋势,成绩巨大,举世瞩目。单就我国的藏学而言,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藏族语言、历史、医药、历法,还是藏族的文学艺术、绘画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学科都出现了一批新著,引起学术界重视,其中尤其是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藏文写卷(亦称吐蕃文书或古藏文写卷)以及与吐蕃相关的汉文写卷的研究,也是在此时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与国外敦煌学研究接轨,并行发展,令人欣慰。

20世纪初斯坦因(A. Stein, 1862—1943)、伯希和(P. Pelliot, 1878—1945)等人先后潜入敦煌,将吾国文化宝藏巧取豪夺,席卷而去,遂使敦煌瑰宝流失异邦,西方学者得以垄断把持,居为奇货。其中就有约五千余卷的藏文写卷流落巴黎和伦敦,吾国学者鲜有知其内容者,更谈不上插手研究了。于道泉教授(1901—1992)实为吾国学术界近代从事藏学研究之先驱,30年代初负笈巴黎,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师从巴考(J. Bacot, 1890—1967)研修藏文,深知敦煌藏文写卷之重要,且受北平图书馆之委托,谋求复制、摄影该项写本,准备携回国内,供国人研究之用。当他转赴伦敦教书时,商之于大英图书馆翟理斯(L. A. Giles, 英国汉学名家,中文名字翟林奈,此人专管此项写卷),不期受到百般阻挠,根本不让接触,支吾搪塞,缠磨推托,使其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于道泉先生每提及此事,十分愤慨,痛心疾首。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怀着兴奋激情,回到阔别了19年的祖国。他回到北平后,立即与北京大学东方系主任季羨林教授合作,创设藏语组,是为解放后国内



高等学府开展藏学研究之始。旋即在中央政府直接关怀下,在开办国内第一所民族院校——中央民族学院之时,建立少数民族语文系,而藏文专业被列为第一要务。除将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的藏语组师生并入外,又在全国若干高校中抽调一部分骨干,集中突击藏语,适应和平解放了的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的需要。于道泉先生知道科研应该服从于当时的中心任务,只能将敦煌藏文写卷的研究心愿寄望于将来。20世纪60年代初,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办古藏文研究班,专门培养研究藏族传统文化的人才。应该说这是开展敦煌藏文写卷的大好时机,但是,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极大,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已完全断绝,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资料,也无从了解必要的学术进展信息。在这种环境下,若贸然提出开展此项研究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所以,审时度势,我只好把于道泉先生慨然相赠的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巴考等人的专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即P. T. 1286,1287,1288等若干写本的法文注解读本)藏诸篋中,以待时日,而在“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的讲座稿中,略加介绍而已。到了史无前例的时期,众凶肆虐,群魔乱舞,学术资料横遭洗劫,各项莫须有的罪名铺天盖地而来,真有今世何世之叹。迨下放“五七干校”,又以待罪之身,听候发落,惶惶然,茫茫然,不知如何了局。但,朝夕随身者,竟是这一册《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在写不完的检讨和自我批评的间歇,利用被发落在炊事房和管果树的空当,断断续续把书中的藏文转写,逐字还原,再抄成便于携带的小卡片藏于衣袋之中,以便抓住农事劳动、炊事劳动之余,玩味琢磨。三年之内,虽然屡遭摧残、打击,心力交瘁,但奇迹般地居然把全书译出,私心窃喜,以为没有白来“干校”一趟。后来,不可一世的“副统帅”机毁人亡,曝尸温都尔汗,我很快回到北京。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接受一项外事任务(那时由“牛鬼蛇神”接触外事,真是不可思议),居然让于道泉先生负责,我来协助,去解读伊朗驻华大使馆委托的、在我国出土的一份藏文写卷。后来我们方知道,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御妹阿什拉芙公主,当时担任着伊朗王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对藏传佛教艺术情有独钟,收藏了一批唐卡,而她的儿子尼果亲王更精此道,渴望从我国得到一些资料和帮助。好!于教授虽已73岁



高龄,但乐此不疲,欣然接受此项任务。每天我们两人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北海西侧文津街7号的老馆,不是今天的北图)去查资料。回忆起来,非常有趣。他老人家本是北平图书馆20年代起的兼任“研究馆员”,对馆内收藏的有关少数民族书刊非常熟悉,可是解放后总也得不到机会清理馆藏有关藏学的外国资料。这一次使他十分吃惊,从北图尘封已久的一大堆一大堆的进口书刊中搜寻、掸土,从而读到许多老朋友如R. A. Stein(石泰安)、F. W. Thomas(托马斯)、M. Lalou(拉露)、G. Tucci(图齐)以及李方桂、张琨等人的名字,又读到许多新作,更是许多生疏的新人,后起之秀。如G. Uray(乌瑞)、A. M. Blondeau(布隆多夫人)、A. W. Sparian(斯巴尼安·麦克唐纳夫人)、L. Petech(伯戴克)、山口瑞凤、今枝由郎等人的新人新作,都使他有时激动,有时沉思,有时扼腕叹息。我们连续不断地在北京图书馆、科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抄录资料。所幸,我们手中持有军宣队特许入馆查书的证明信(读书成了特权,也算一绝)。当时,这三家号称中心的图书馆内,除了一些查阅旧报纸准备进行大批判的稀稀疏疏的几位红卫兵“小将”,只有我们二人算是“常客”了,工作极为方便,毫无干扰。每天中午,用烧饼、油条充当午餐,喝些馆内提供的开水。生活清苦,可是精神上却是十分愉快的。上面提到的许多国外学者的论著,绝大部分与敦煌文献有关,更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差距,认识到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必须做一些实际工作,才能在这一领域内无愧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交出为伊朗驻华大使馆所需要的那份苯教(bon)文书解读(英文本又经吴文藻先生和冰心先生审读一遍)的同时,又草撰一份“国外藏学研究论著目录(1949—1970)”,在几位热心于此道的同行中传阅。此时,在于先生的鼓励下,我动手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注》的草稿抄录成册,交到青海民族学院,由王青山同志、李延恺同志以汉藏文分两册铅印,在同行者内部流通。后,陈践同志热情可感,对此亦产生浓厚的兴趣,积极参与此项研究课题,协助我把此书的整理、补充、誊写工作担当起来。最后,交到民族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我国著名的汉藏语专家、古文字学家闻宥教授(1900—1985)亲为题写封面。此后,我的有关古藏文研究的另外两书——《吐蕃金石



录》和《吐蕃简牍综录》均请闻宥教授题签。他那苍古刚毅、遒劲雄厚的笔力酷似他为人之风骨。马雍同志(1930—1985)知道我在译注此书,十分慷慨地把他从根据巴考等人的法文译成汉文的“大事纪年”交我参考,也是令人感念的友情。此书出版三千册很快脱销,这是我国关于敦煌藏文写卷的第一本书。此书价值跨越哲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学等学科,受到欢迎自有道理。后来,由于我有机会数次参加国际藏学会议,碰到国外的同行,交流到不少西方同行的作品;又有机会去欧洲教书,得以访问巴黎和伦敦,亲自去查验、翻阅收藏在那里的敦煌原件;尤其是得到巴黎所藏的,由石泰安教授指导麦克唐纳夫人(即斯巴尼安女士)和今枝由郎编选的两巨册《法藏敦煌文献写卷选刊》,琳琅满目,珠玑毕备。这时,我们的工作有了大的进展:《吐蕃法制考》、《吐蕃官制考》、《敦煌藏文写卷〈战国策〉译解》、《敦煌藏文写卷〈尚书〉译解》等论文一一发表,并相继出版了数本专著:除上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注》、《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外,尚有《敦煌吐蕃文献选》、《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西藏文史考信集》等,心中才稍稍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在工作中每感汉文史料不足,在解读吐蕃文献时,常有空乏无力之感,很想得到有力的印证。多亏苏晋仁(公望)先生花了二三十年时间整理出版了两本汉文吐蕃史料著作:《〈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和《通鉴吐蕃史料》。这样一来,为我增加了底气。吐蕃史料在藏汉两种文献齐头并进的基础上,充实多了。苏晋仁先生约我一起在中央民族学院合开一门新课——“吐蕃史研究”(各讲一半)。在讲课中,藏汉文史料相互呼应和补充,效果很好。后来我把讲稿的一部分整理成《吐蕃文化》,作为史筠同志主编的“民族文库”之一出版(1987)。书出了,但觉得材料有限,深感汉文资料之不足,应该在史料上加强收集,于是便与陈践同志合作辑录出《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集》,可惜至今没有出版。

至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与吐蕃史料密切相关的汉文写本,其史料价值之高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心仪已久,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辑录比勘,十分遗憾。

内容丰富的敦煌吐蕃文献,对于吐蕃史和汉藏关系史来说,无论就



历史、地理，还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学，都是头等重要的资料。于道泉先生、王重民先生(1903—1966)、向达先生(1900—1966)诸位前辈都曾对此花过心力，在海外访问、研究期间，孜孜不倦搜集、抄录，做过介绍。但形成文字、公诸于世的不多。

敦煌文献中所见汉文吐蕃佛教典籍为数不少，其中尤以县旷《大乘二十二问》、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法成的有关著作最引人注目。

《大乘二十二问》，一卷，见于 S. 2674，首尾俱全，尾题为“丁卯年(787)三月九日写毕，比丘法灯书”。另有 P. 2287、S. 4297、S. 2707、P. 2835、P. 2690、北位 20 等号。文中罗列有关大小乘教理、教义、教史方面的问题共 22 个，诸如涅槃、三身、佛性、真如、十地菩萨、三乘异同、部派分裂之类，然后答之。此系县旷回答吐蕃赞普关于佛法的垂询而撰，是研究县旷思想及吐蕃统治时期河西佛教状况的珍贵资料。巴宙、上山大峻等学者都曾对该写卷进行过研究、校录。

法国著名汉、藏学家戴密微(P. Demieville, 1894—1979)根据 P. 4646 号卷子《顿悟大乘正理决》等若干汉文卷子，撰写出名重一时的《吐蕃僧诤记》(Le Concile de Lhasa, 1952)。此书对于汉地禅僧在藏族中的活动、禅宗教法在西藏的传播以及 8 世纪汉僧(以摩诃衍为首)和印度僧侣(以莲花戒为首)在吐蕃赞普主持下所进行的“顿”、“渐”之争作了十分缜密而详尽的探讨，引起了国际学术界极大的兴趣。

唐代藏族高僧法成的著作在敦煌石窟中留存极多。其中有法成由汉译藏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楞伽阿波多罗尼经》、《善恶因果经》、《贤愚经》等 20 部，藏译汉者有《般若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释迦牟尼如来象法灭尽之记》等 5 部，著述有《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叹诸佛如来无染着德赞》等 3 部。另有法成讲、弟子谈迅、福慧、法镜、洪真、恒安、一真、明照、智慧山等手录的《瑜伽师地论讲义录》等。这些对研究古代吐蕃乃至河西地区的佛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资料。县旷、王锡、法成的著作，大致代表了禅宗在吐蕃传入、兴盛和衰微三个历史阶段。

再如 P. 2555 号《诗文集》残卷是由王重民先生在巴黎录文后带回



北京的。他在1973年将一包从巴黎录回的关于吐蕃史的敦煌文书交给我,期望我能进行研究、使用。当时正是疯狂的“文革”期间,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聊作自我娱乐而已。王先生早在1934—1939年间协助巴黎国立图书馆为伯希和写本编目期间就有计划整理、出版其中的汉文吐蕃史料。万万想不到,1975年王重民先生被迫害致死,过早结束了他辛勤忙碌的生命。我在悲愤之余,把王先生的手稿录出,找到文物出版社俞筱尧、沈玉成、杨瑾几位好友,请他们设法刊布出来以告慰有三先生的在天之灵(1977年《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

P. 2555号卷背面窦昊撰《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也有王先生从巴黎携回的录文一直珍藏在身边。适巧,邓小南同志临大学毕业时以此卷的释读作为毕业论文,她持考证、释读的稿子来跟我讨论。真不愧是邓广铭(恭三)先生的才女,其工作非常认真仔细,所论很有发明,颇具见地。后来,小南同志的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982年卷上,题为《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算是践行了有三先生的遗愿。

以上是个人从事藏学研究中,仅就敦煌文献有关吐蕃与史事的一点感受,略抒感怀。

## 二

今天,我们研究藏学研究的发展史,要对藏族学者所作的贡献予以足够的重视,像历史上的米拉日巴(1040—1123)、萨迦班智达(1182—1251)、八思巴(1235—1280)、宗喀巴(1357—1459)和五世达赖(1617—1682)等众多藏族文化名人。他们在史学、哲学和文学、宗教学上的贡献已经是学术界耳熟能详,但对于现代藏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更敦群培(1903—1951)却一直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最近,青年学者杜永彬写出《二十世纪西藏奇僧——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佩大师评传》一书,颇有振聋发聩之功。仅在这里,以我所知作一番介绍,希望能引起关心藏学研究的同行们的注意,更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把藏族学者的成就和学术贡献表而出之,受到同行之关注。

更敦群培(Dge-vdun-chos-vphel)可称为20世纪藏族学术界和思



想界的奇人和伟人。他毕生都在追求学问,追求真理。在历史、地理、宗教、考古、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俗、伦理乃至医学等十来个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留下一批专著,名声很大。但是,造化弄人,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却命运很惨,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毁誉交集,穷病相困。竟在48岁的盛年,困厄致死。由于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言辞犀利,不拘小节,诙谐幽默,针对贵族上层的腐败、僧人的堕落,嬉笑怒骂,颇让西藏当权者难以忍受,但也无法处置。最后,还是以莫须有之罪名,被投入囹圄,困顿疲惫,屈辱懊恼。可惜一代英才,就糟踏在封建农奴制度的沉闷社会之中,竟抑郁寡欢,孤独寂寞,撒手人寰,令人扼腕。智者是孤独的,思想家更是寂寞的。尤其是在西藏那样阴霾霉灰的社会中,如像生活在一个密封的罐头里,见不到一丝阳光,透不出一丝新鲜空气,整个社会被箍得密密匝匝,人们只能浑浑噩噩,自生自灭,谁也谈不上什么前途、出路来。像更敦群培那样敏感的学人,一旦从外面吸收了一些新空气,看到铁门缝中透露出来一丝微光,自然就会躁急、愤懑,而活动起来,对那个社会也逐渐更加难以忍受了。他的高度的超前意识,往往表现为特立独行,在茫茫的青藏高原上超然独立,罕与人同。在那寺院林立,教规、等级森严,香烟缭绕,梵呗如涛,信教者铺天盖地的环境之中,居然能是那样清醒的人,以不怕死、不媚俗的豪迈胸襟,在雪域大地上耸立起一座思想学术的丰碑——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底蕴、中国西部的时代号角。时代浪潮汹涌澎湃、文化与社会相互激荡之际,他的言论,他的著作,以及他的行为,表现为藏族人民在风雪高原上雄浑、深沉的精神魅力。终于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解放年头,可惜,更敦群培却与这一革命者向往已久的岁月擦肩而过了!

此后40多年(1959年至今),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学界没有机缘研究像更敦群培这样的历史人物。如今,这一历史任务落到了年轻一代同志的肩上了。

我最早了解更敦群培,是从接触其著作《白史》开始的。当时我正着手释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亡友傅师仲先生向我推荐这本书。他说,这是藏族人最早接触收藏在国外的敦煌卷子的人,他的释读文字,有些见解还是不错的。我认真读了以后,既感到惊奇,又非常钦佩,



想不到还有来自安多的如此渊博的藏族大学者。后来,我又陆续读了他的一些著作如《智游佛国漫记》等,知道了俄国学者罗列赫翻译《青史》为英文时,得到更敦群培的帮助才完成如此优秀的译本。此后碰到跟他接触过的人都在赞扬他,怀念他。80年代我到海外教书、读书,又听到一些朋友谈到他,也见到他的惊世骇俗的专著《情欲论》(Vdod-pavi-bstan-bcos),说了不少为当时难容的话。这是在前人这一类著作基础上发挥了自己的观点,对性的伦理和性的风俗的评述,其中心思想是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

从生平、学术和思想三方面全面、系统地对更敦群培进行研究,钩沉索隐,辨伪发覆,对其扑朔迷离的人生经历进行考证辨析,清楚地勾勒出更敦群培传奇而坎坷的一生;阐明其精湛的学术成就和具有现代色彩、科学特点的治学方法;揭示其离经叛道的宗教思想、哲学思想、人文思想、启蒙思想、爱国思想和革命思想,向世人展现作为思想家更敦群培的形象。并且与国内的高僧、学术大师和启蒙思想家进行比较,指出更敦群培所作出的划时代的两大贡献——开创藏族现代藏学;冲破神学史观,开创人文史观。这方面杜著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填补了更敦群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指出了其时代局限,对更敦群培做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近年来,国内外陆续出版的关于更敦群培的作品主要有:《更敦群培文选》(藏文)、《更敦群培文集》(藏文,3卷)、《更敦群培文集精要》(汉文)、《安多的托钵僧》(法文)。近若干年来,国内研究藏族史的同志不少,多数注意历史事件的记述和历史文献的诠释叙议,出版了不少佳作;但对于历史人物,尤其是近现代的历史人物,研究者实在少见,比方近现代中影响极大的几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如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龙厦、江乐金,乃至邦达昌家族……,都是值得研究者在今后下一番功夫探索的。

### 三

最后但很重要的一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1993)以后,我本人应聘到清华兼职讲课;后来,启龙毕业后分配到清华大学中





文系任教,我们就商量过选《中国藏学史》这一题目来做。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实际上是陈寅恪先生(1890—1969)启其源,于道泉先生(1901—1992)继其后开辟了中国现代藏学研究,我们选定这一题目也是为了纪念这两位师尊及其他学术前辈。我们做过几次商量,初步拟了提纲、框架。但大多是启龙和小咏夫妇俩搜集的资料,小咏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撰写,特别是启龙在韩国出访的一年当中,利用一切空隙时间,最终完成了此书。我本人实际上所做的工作有限,不过,可以看出,从陈寅恪先生——于道泉先生——我——启龙等一代青年学者,我们的学术思路、科研传统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我可以引用陈寅恪先生的一首诗来做这一序文的结语:

唐碑墨本手摩挲,回忆当年感慨多。

遯迹不烦飞驿鸟,和林还别贡峰驼。

赐秦鹑首天仍醉,受虏狼头世敢诃。

自古长安如奕戏,收枰一著奈君何。

2002年4月8日于北京

在我起草这篇序言后八日,即2002年4月16日,苏晋仁(公望)先生病逝于北京。

公望先生生前对藏学事业十分关注,留下不少专著,将来有机会再表而出之,以表怀念。

2002年12月20日看校样后补书